

[31] *FRUS, 1952-1954, Vol 12, p. 577.*

[32] [34] *FRUS, 1952-1954, Vol 13, p. 1758, pp. 1819-1821.*

[36] [40] 李连庆. 大外交家周恩来·舌战日内瓦 [M].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4. 306-311, 335

#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研究述评

孙德刚

〔摘要〕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主要分为五大议题：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美国精英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危机管理；阿拉伯国家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内幕；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过程；石油武器与第四次中东战争。从研究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依据当事人回忆录、期刊报纸和政府公报；从方法论来看，学者们多采用史学方法。此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研究成果几乎被西方学者垄断，使学术偏见难以避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尝试依然处于起步阶段。随着美国、俄罗斯、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等相关外交档案与政策文件逐步解密，重新审视该议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关键词〕 第四次中东战争；阿以冲突；美苏缓和

〔中图分类号〕 K38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2008)02-0056-06

目前学界对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当事人回忆录、论著、报告文学、传记、论文、录像片等相继问世，依据的研究材料包括当时的新闻报道、政府政策宣言、联合国决议、领导人讲话、民意测验、宣传图片等。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外学者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主要包括五大议题。

## 一、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

苏联与第四次中东战争关系的历史档案尚未大批解密，但有些公共文件与一手资料已经相继出版，如罗伊(Yakov Ro'i)编写的《从蚕食到卷入：苏联中东政策的文献研究，1945-1973》。<sup>①</sup>1974年，美国迈阿密大学的科勒(Foy D. Kohler)等人便撰写了《苏联与1973年十月战争》

一书，认为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政策是在美苏缓和与构建全球“反帝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制定的，苏联既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又希望扩大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其对阿拉伯国家的军售是诱发战争的原因之一。<sup>②</sup>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戈兰(Galia Golan)在《赎罪日战争及其之后：苏联与中东危机》一书中也认为，苏联的中东政策导致了第四次战争的爆发，<sup>③</sup>但是，勃列日涅夫曾一度阻止埃及和叙利亚发动战争，甚至冒同埃及断交的风险拒绝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直至战争爆发前苏联领导人柯西金仍强调阿以冲突应当以政治手段加以解决，说明苏联对埃及和叙利亚发动战争加以抑制的一面常常被忽略了。1990年，戈兰

① Galia Golan, *Yom Kippur and Afte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iddle East Cri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21. 此外，以色列学者迈克尔·康菲诺等人也对苏联中东政策作了深入探讨，参见 Michael Confino and Shimon Cassell eds., *The U. S. S. R. and the Middle East*, Jerusalem: Israel University Press, 1973.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06JZD0013)

〔作者简介〕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7-2008年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访问学者，上海 200083。

又完成了另一本著作《苏联在中东的政策：从二战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详细介绍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苏联与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首脑外交，强调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援助是贯穿双边关系的主线。<sup>[3]</sup>总体来看，此书与他1976年出版的论著都采用史学研究方法。

美国学者格拉斯曼 (Jon D. Glasman) 在《对阿拉伯国家军售：苏联与中东战争》一书中认为，自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苏联就对阿拉伯国家提供各种防御性与进攻性武器，客观上为阿以爆发战争提供了可能。<sup>[4]</sup>格拉斯曼基本采取史学研究方法，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期刊杂志和政府公开文件，资料较为翔实。

英国政治学者达维沙 (Karen Davisha) 则从苏联与埃及的关系视角，考察了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反应。作者从1955-1978年苏埃关系的历史演变谈起，突出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苏联对埃及外交政策诸多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sup>[4]</sup>作者从政治学角度分析苏埃关系，将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和历史学相结合，使用历史个案考察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框架。

美国巴尔的摩希伯来大学弗里德曼 (Robert O. Freedman) 在《1970年以来苏联的中东政策》一书中将苏联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sup>[5]</sup>作者援引大量的政府官员讲话和当时的报纸杂志，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苏联与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利益与分歧。1977年，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苏联问题专家鲁宾斯坦 (Alvin Z. Rubinstein) 在《红星照耀尼罗河》一书中，依据掌握的大量史料，考察了苏联与埃及联盟关系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面临的巨大挑战，突出了领导人个性特征对于国家间关系起到的重要作用。<sup>[6]</sup>1985年，美国另一位冷战史研究专家加特霍夫 (Raymond Garthoff) 在《缓和与对抗》一书中，从美苏缓和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勃列日涅夫一直处于缓和 (同美国寻求合作) 与对抗 (在阿以问题上同美国发生冲突) 的矛盾之中。<sup>[6]</sup>一方面，苏联希望通过缓和获得美国最惠国待遇，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另一方面，苏联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军购要求又难以置若罔闻，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预示着苏联这一骑墙政策的破产。

此外，埃及官员与学者也作了大量研究。如埃及前外交部长海卡尔 (Mohamed Heikal) 根据自己收集的文件和回忆录，与埃及官员的证词等相关公共文件，撰写了《狮身人首像与首长：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兴衰》一书。该书向人们展示了重要历史图片和细节，并认为第四次中东战

争是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下降的起点。<sup>[7]</sup>然而，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承认的那样，这本书不如说是政治家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描述。

## 二、美国精英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危机管理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一场国际危机，它与尼克松总统所面临的国内危机——水门事件几乎同时达到高潮，对尼克松领导班子的决策能力构成了严峻挑战。作为美方的主要当事人，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谈到了美苏缓和对此危机的影响。<sup>[8]</sup>1976年，美国前驻也门和阿联酋大使鲁 (William Rugh) 在《十月战争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阿拉伯人视角》一书中描述了美国如何一步步介入到了中东战争。<sup>[8]</sup>美国学者匡特 (William R. Quandt) 的论著《抉择的十年：美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1967-1976》认为，美国对此次危机的处理主要是从美苏关系的角度出发的。既然阿以战争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美国将不得不重新武装以色列，这激起了阿拉伯国家的愤怒，它们纷纷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无疑损害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sup>[9]</sup>

美国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西奇曼 (Harvey Sicherman) 在1976年出版的《赎罪日战争：幻想的破灭》一书中较为粗略地介绍了美国精英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反应。西奇曼认为，作为刚刚上任的国务卿，基辛格强调减少与苏联爆发核战争与产生核对抗的危险，以促进美苏之间的缓和，因此尽力低调处理此次危机；尼克松总统由于深陷水门事件丑闻，倾向于高调处理此次危机，以显示美国总统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卓越的领导才能，改变自己严重受损的总统形象。<sup>[10]</sup>西奇曼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假定，但由于许多一手档案材料与当事人回忆录当时尚未解密，他难以找到足够的材料加以证实。

近些年来，美国许多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美国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关系。香农 (Vaughn P. Shannon) 在《制衡行为：美国外交政策与阿以冲突》一书中将美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表现视为一种制衡行为，在中东拥有以色列这样可靠、强大的反共产主义盟友符合美国利益。<sup>[11]</sup>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了哈尼马基 (Jussi Hanhinen) 的论著《有缺陷的大师：基辛格与美国外交政策》，解读了美国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认为基辛格在战争后期形势对以色列有利的情况下，对苏联提出的停火建议一直采取拖延政策，实际上是为以色列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从档案中发现，基辛格明确告诉以色列总理梅厄不

① Jon D. Glasman, *Arms for the Arabs: The Soviet Union an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77-197. 关于这一问题的中文文献有刘竞等《苏联中东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② Alvin Rubinstein, *Red Star on the Ni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pter Eight. 关于苏联与埃及双边关系还可参见 Mohamed Mahmoud El-Hussini, *Soviet-Egyptian Relations, 1945-198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③ See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and Michael Joseph, 1982, Chapter Six.

必遵守安理会第 338 号决议的立场, 突出了基辛格擅长秘密外交的特点, 说服力较强。<sup>①</sup>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 还有些著作虽不专门探讨此问题, 但也涉及到了该议题某些方面的研究。<sup>②</sup>

### 三、阿拉伯国家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内幕

目前已出版的较权威一手资料多是有关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讲话、声明和对外政策公报等, 主要研究恐怖主义的拉克 (Walter Laqueur) 和鲁宾 (Bary Rubin) 编写的《以色列—阿拉伯读本: 中东冲突历史文件》就是其中较系统者, 成为学者竞相引用的权威资料。<sup>[12]</sup>此外, 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和叙利亚领导人的回忆录成为学者研究此次战争的重要材料, 特别是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公开日记详细解释了埃及为何在 1972 年突然决定驱逐苏联军事专家以及为何要联合叙利亚发动战争。<sup>[13]</sup>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学者主要考察了阿拉伯国家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关系, 但总体而言宣传多于学术。部分欧洲学者, 如康策尔曼 (Gerhard Konzermann) 则从第三方的视角, 较为客观地审视了此次战争。他从战术的角度细致分析了埃及和叙利亚策划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过程。<sup>[14]</sup>尽管该书对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的动机与过程作了详细记录, 但缺乏必要的前期研究成果, 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怀疑。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 英国牛津大学学者、《经济学家》驻中东记者梦露 (Elizabeth Monroe) 与英国国防部官员霍克利 (A. H. Farrar-Hockley) 等人完成了《阿以战争, 1973 年十月战争的背景与事件》一书。他们认为, 埃及与叙利亚充分利用了以色列的弱点而发动了战争。<sup>③</sup>该书从军事学视角出发, 将阿拉伯国家视为一个整体, 分析了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解组织等阿拉伯政治势力对战争的态度和立场。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时英国《周末电讯报》驻中东的记者布洛克 (John Bullch) 在《战争史: 1967—1973 年的中东》

的第二章和第六章深入探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阿拉伯国内原因。他认为, 由于阿拉伯国家崇尚威权政治, 埃及总统萨达特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等阿拉伯少壮派纷纷掌握权柄使阿以爆发战争成为可能。<sup>[15]</sup>艾伦 (Peter Allen) 在《赎罪日战争》一书中认为埃及发动先发制人战争从战术角度来看是错误的, 但从战略角度来看是正确的, 因为萨达特无意在军事上战胜以色列, 而是寄希望于通过制造一场危机来引起国际社会对阿拉伯领土诉求问题的关注, 以显示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是非法的。<sup>[16]</sup>遗憾的是, 上述两位作者并未分析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变化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

1978 年, 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迪普伊 (Trevor Dupuy) 撰写了《躲避的胜利: 阿以战争, 1947—1974》, 也从军事学角度审视阿以之间爆发的四次中东战争, 认为尽管以色列拥有天然与人工屏障, 但埃及与叙利亚两国通过精心策划,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使对以色列的打击具有震慑的效果。<sup>[17]</sup>

由于欧美和以色列在这一议题的研究成果方面占有绝对优势, 所以自然掌握着话语权, 能够体现阿拉伯人观点和立场的论著并不多见。为弥补这一不足, 纳赛尔高级军事学院军事历史学教授巴德里 (Hassan el Badri) 等人撰写了《斋月战争, 1973 年》一书。作者从埃及军事家的视角, 澄清了西方学者对阿拉伯人的误解,<sup>[18]</sup>试图揭示阿拉伯国家精诚团结、取得辉煌战绩, 以及阿拉伯国家战后积极参与中东和谈的努力的一面。此外, 1980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时期埃及总参谋长沙兹利 (Saad el Shazly) 的日记《横渡苏伊士运河》也在美国出版。沙兹利详细介绍了埃及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政治与军事准备, 认为埃及与苏联总体来看争是合作伙伴内部的争, 两国在利益层面具有相互依赖性。<sup>[19]</sup>

至于战争的结果, 约翰逊 (Dominic D. P. Johnson) 和蒂尔尼 (Dominic Tierney) 认为, 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果来

① Jusi Hanhak, *The Flawed Architect: 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13. 也有学者认为基辛格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开展的中东外交取得了卓越成就, 参见 Robert D. Schulzinger, *Henry Kissinger: Doctor of Diplom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43—153.

② See David Mitchell, *Making Foreign Policy: Presidential Management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urlington: Ashgate, 2005; Paul Charles Merkley, *American Presidents, Religion and Israel*, Westport: Praeger, 2004; Thomas G. Paterson, etc.,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 History since 1895*, 6th ed.,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5. 从美苏对抗角度研究此次战争的中文文献有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6 年;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还可参见 T. G. Fraser, *The USA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World War 2*,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1989; John Young and John K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1945: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从美苏缓和的角度研究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还有 Antony Best, etc.,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Bree Burns, *America in the 1970s*, New York: Stanesong Press, 2006.

③ Elizabeth Monroe, Farrar-Hockley, Anthony H., *The Arab-Israeli War: October 1973 Background and Events*, Londo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5, p. 15. 从史学的角度研究阿以冲突的成果还有 George W. Gawrych, *The Albatross of Decisive Victory: War and Policy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in the 1967 and 1973 Arab-Israeli War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看,叙利亚在战场上完全失败了;以色列并没有获得太多的胜利;埃及在战争中取得了一定成功,因为埃及恢复了国家荣誉、尊严和信心,这种胜利感使萨达特总统获得了重要的政治资本,积极参与中东和谈。<sup>[20]</sup>

以色列第六任总统赫佐格(Chaim Herzog)是研究阿以战争的著名学者,他长期服务于以色列国防部,掌握了阿以冲突的许多重要资料信息。他在《阿以战争:中东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详细介绍了阿拉伯国家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过程。他认为,埃及之所以在战争初期取得重大胜利是因为它采取了许多欺诈手段,还不断释放同以色列政治谈判的烟雾,并最终利用以色列赎罪日发动袭击等。<sup>[21]</sup>赫佐格试图从以色列军事历史学角度梳理阿以冲突的脉络,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民族偏见。

#### 四、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过程

目前关于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过程研究的外交档案尚未完全解密,但学者仍然可以掌握部分一手资料,如拉宾诺维奇(Itamar Rabinovich)等人编写的《中东的以色列:1948年以来社会、政治和对外关系文件与读本》。<sup>①</sup>此外,当时学者们所做的民意测验、舆论评估等材料也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例如,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戴维斯(Moshe Davis)在《赎罪日战争:以色列与犹太人》一书中以采访的形式,收集了战争爆发前后来自世界各地犹太人社区对战争的反应。被采访者拥有不同的国家社会背景和职业,客观反映了当时犹太人的思想状况。<sup>②</sup>但由于被采访者情况差别甚大,内容比较零碎,甚至难免提供了错误信息。

在二手资料中,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主体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以色列政府的当事人,二是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学者。前者包括以色列政界领导人所撰写的回忆录,如当时以色列总理梅厄《我的生活》,以色列驻美大使埃班、以色列前参谋长巴列夫的回忆录等。<sup>[22]</sup>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Moshe Dayan)在《达扬:我的生活故事》中较为详细地从军人的视角分析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对以色列安全环

境的影响。<sup>[23]</sup>该回忆录的价值在于它向读者提供了战争爆发的内部资料。1974和1992年两次出任以色列总理的拉宾(Yitzhak Rabin)在回忆录中则从政治家的视角揭示了以色列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内幕,指出此次战争对以色列国内政治特别是工党权力结构产生了巨大冲击。<sup>[24]</sup>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坦克战的规模堪称二战结束以来之最,空战与海战一度也较为激烈。英国著名军事记者巴兰斯(Edgar O'Balance)在《没有胜利,没有征服:赎罪日战争》一书中认为,从战术角度来看,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基本打成了平手,双方既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也没有被对方征服。<sup>③</sup>但作者缺乏从战略角度的系统考量,对以色列在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也着墨不多。牛津大学教授施莱姆(Avi Shlaim)在《铁墙: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一书中,从以色列的视角,提出应当以修正主义眼光看待阿以冲突,将第四次中东战争放在1947-1998年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立场的宏观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施莱姆认为,以色列总理梅厄生性固执,对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并非基于理性,而是基于情感与直觉,坚信阿拉伯人随时会再次导演一场新的犹太人大屠杀。<sup>[25]</sup>

美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沃斯(Richard Worth)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一书中以简洁的文字描述了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对形势的误判。<sup>[26]</sup>该书未能探讨苏联与美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应是其不足之处。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雷彻(Michael Brecher)是危机管理研究的大师级人物,他在《危机决策:以色列,1967和1973年》一书中,以第三次与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的危机决策为比较分析对象,考察了关于危机决策的基本理论,认为危机决策受决策者、心理环境、决策流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sup>④</sup>

以色列人布雷格曼(Ahron Bregman)博士曾经在军队中服役六年,他在《以色列历史》一书中描述了以色列情报失误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他认为,导致以色列情报

① Itamar Rabinovich and Jehuda Reinharz eds., *Israel in the Middle East: Documents and Readings on Society,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1948 -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40-248. 此外,拉宾诺维奇主编的论文集中也使用了许多重要的一手资料。参见 Itamar Rabinovich and Haim Shaked eds., *From June to October: the Middle East between 1967 and 1973*,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Books, 1978.

② Davis Moshe, *The Yom Kippur War: Israel and the Jewish People*, New York: Arno Press, 1974, pp. XI- XIII. 关于中东国家的政府公告与领导人讲话可参见尹崇敬《中东问题 100年: 1897-1997》,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年。

③ Edgar O'Balance, *No Victor, No Vanquished: the Yom Kippur War*, San Rafael, Calif.: Presidio Press, 1978. Chapter One. 从战术角度研究埃及与叙利亚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论著还可参见 Frank Aker, *October 1973: The Arab-Israeli War*,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85; Martin Van Creveld, *Military Lessons of the Yom Kippur War: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5; Ezer Weizman, *The Battle for Peac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1. 相关中文文献有肖昱社《喋血赎罪日: 第四次中东战争纪实》,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年; 于江欣《烽火十月: 第四次中东战争》,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0年; 袁文靖《中东战争史》,台北: 国际现势周刊社, 1985年。

④ See Michael Brecher and Benjamin Geist, *Decisions in Crisis: Israel, 1967 and 197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机构摩萨德失误的是来自埃及的一位“谍中谍”。这位自称纳赛尔女婿的青年向摩萨德提供了假情报,结果以政府即便在战争爆发的当天仍然坚信战争会在晚上六点(而不是下午两点爆发),大大延误了以色列的国内动员。<sup>[27]</sup>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汉德尔(Michael Handel)专门研究以色列的政治—军事战略,他在《知觉、错觉与突袭:以赎罪日战争为例》一书中,分析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突袭战略实施的必要条件,并提出突袭战略的三个基本假设。从第四次中东战争来看,埃及与叙利亚在实施突袭战略方面受国内决策环境、中东区域环境与全球环境的三重影响。<sup>[28]</sup>冷战结束后,以色列学者们重新对第四次中东战争进行了回顾,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和平促进研究所还组织编写了论文集《赎罪日战争再探讨》。在论文集集中,诸多以色列学者对此次战争中以色列的情报失误、军事动员、外交、国内精英人士变动,以及空间力量问题等重新进行了审视。<sup>[29]</sup>从各专题研究的学理深度来看,以色列在冷战结束后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关于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过程的研究还散见于一些以色列与犹太史著作中。<sup>①</sup>

### 五、石油武器与第四次中东战争

战争爆发后不久,阿拉伯世界出现了同仇敌忾的局面,埃及和叙利亚两个前线国家获得了利比亚、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等阿拉伯产油国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阿拉伯产油国还将石油作为军事武器,通过石油禁运有效防止了欧洲西方大国和日本等美国的盟国在战争爆发后支持以色列,使它们不得不奉行中立政策。在论文集《中东的考验:1973年10月阿以战争研究》中,众多阿拉伯国家学者围绕此次战争爆发的阿拉伯国内因素、国际因素以及理论分析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学者们认为,阿拉伯国家成功运用石油武器,结束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为阿拉伯国家赢得了尊严和信心。<sup>②</sup>汉德尔将史学方法与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尝试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在史实中加以检验,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

1976年,美国乔治敦大学中东问题专家利伯(Robert J. Lieber)在《石油与中东战争:能源危机中的欧洲》一书中认

为,石油危机爆发后,英、德、法、意甚至为维护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不惜向阿拉伯国家示好,敦促以色列撤出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人土地。这无疑给美国领导下的北约构成了巨大挑战。<sup>③</sup>该书是讨论阿拉伯石油武器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力作,既涉及欧洲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涉及美欧关系,并探讨了欧共体能源政策对此次危机的影响。

### 六、第四次中东战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阿以关系的分水岭。它既是阿拉伯与犹太这两个民族之间爆发的最后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也是阿以双方解决矛盾的端起。目前,关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五大议题,且各议题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从形式来看,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论著与论文两大类,但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成果仍以论著为主。从研究内容来看,绝大部分学者都将研究对象集中在战争爆发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方面,尤其以埃及和苏联的外交政策为主;从方法论来看,学者们多运用史学研究方法,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梳理来洞察历史的原貌,同时也有些学者试图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将历史学、军事学、政治学乃至心理学研究方法融为一体。

目前关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尚存在若干不足之处。首先,大部分学者主要依据当事人回忆录和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后西方、苏联和中东国家的报纸、杂志、政府公报等进行研究,目前通过解读档案文献来研究此次中东战争的成果相当少见,这使学者难以摆脱媒体偏激报道的影响,也难以摆脱当事人回忆录中有意突出领袖个人作用的负面影响。近些年来,美国政府外交档案中关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文献相继解密,中情局、国安会、国务院和国防部等各部门内部及之间的往来信件与电报等,为重新审视此次战争及其美国的反应提供了重要素材。其次,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美国、欧洲和以色列学者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都处于领先水平,阿拉伯国家、俄罗斯乃至中国均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这无疑使此问题的研究受西方霸权语境的重要影响。要对第四次中东战争有更加全面、清楚的了解,需要有批判性眼光,应从解读档案文献入手,充分利用美国、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等国领导人的回忆录、当事人日记、访谈、图

① See Bernard Reich, *A Brief History of Israel*,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5. Don Peretz *The Arab-Israeli Dispute*,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6. John K. Cooley, *An Alliance against Babylon: The U.S., Israel, and Iraq*,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② Naseer Hasan Anurj, ed., *Middle East Crucible: Studies on the Arab-Israeli War of October 1973*, Wilmette: III Medina Univers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75, pp. 340-345. 关于阿以冲突的文献还可以参见 Dana A. Schmidt, *Armageddon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J. Day, 1974.

③ Robert J. Lieber, *Oil and the Middle East War—Europe in the Energy Crisis*, Cambrid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12.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国家是在尼克松宣布对以大规模援助后才正式宣布石油禁运的,参见 Lester A. Sobel, ed., *Israel and the Arabs: the October 1973 War*,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1974, p. 109.

片、录像带、相关国家的政府外交文件，并参考其他论著和论文，使文献来源尽可能做到多元化，真正还历史以原貌。

〔参考文献〕

- [1] Yaacov Ro'i *From Encroachment to Involvement: A Documentary Study of Soviet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73*, New York: John Wiley, 1974, pp. 578-588.
- [2] Foy D. Kohler, Leon Gouré, and Moshe L. Harve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ctober 1973 Middle East War: the Implications for Deterrence*, Coral Gables, Fla.: Center for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ami, 1974, pp. 21-37.
- [3] Galia Golan, *Soviet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World War Two to Gorbache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82-94.
- [4] Karen Dawisha, *Soviet Foreign Policy Towards Egyp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9, pp. vii-viii.
- [5] Robert O. Freedman, *Soviet Poli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5, pp. vii-viii.
- [6] Garthoff, Raymond, *Deterrence and Confrontatio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pp. 361-373.
- [7] Muhammad Heikal, *Sphinx and Commissar: the Rise and Fall of Soviet Influence in the Arab World*, London: Collins, 1978, pp. 261-267.
- [8] William A. Rugh, *Arab Percep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October War*, Washington, D. C.: Middle East Institute, 1976, pp. 2-12.
- [9] William B. Quandt, *Decade of Decis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 181.
- [10] Harvey Siche, *The Yom Kippur War: End of Illusion?*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6, p. 55, p. 75.
- [11] Vaughn P. Shannon, *Balancing Act: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Burlington: Ashgate, 2003, p. 70.
- [12] 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M. Rubin, *The Israel-Arab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N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 1985, pp. 455-480.
- [13] Raphael Israeli, *The Public Diary of President Sadat, pt. 1, The Road to War (October 1970 - October 1973)*, Leiden: E. J. Brill, 1978, p. 184, p. 365.
- [14] 〔西德〕格哈德·康策尔曼. 第四次中东战争〔M〕. 康幼南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5, 177-183.
- [15] John Bulloch, *The Making of a War: The Middle East from 1967 to 1973*, London: Longman, 1974, pp. 87-90.
- [16] Peter Allen, *The Yom Kippur War*, New York: Scribner, 1982, pp. 30-53.
- [17] Trevor Nevitt Dupuy, *Evasive Victory: the Arab-Israeli Wars, 1947-1974*, London: Macdonald and Janes, 1978, pp. 391-393.
- [18] Hassan El Badri, Taha El Magloub and Mohammed Dia El Din Zohdy, *The Ramadan War, 1973*, Dun Loring, Va. and New York: T. N. Dupuy Associates, 1978, vii.
- [19] Saad el Shazly, *The Crossing of the Suez*, San Francisco: American Middle East Research, 1980, pp. 169-171.
- [20] Dominic D. P. Johnson and Dominic Timex, *Failing to Win: Perception of Victory and Defea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02-204.
- [21] Chaim Herzog, *The Arab-Israeli Wars: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4, 1982, pp. 234-237.
- [22] Goli Meir, *My Life*, New York: Putnam, 1975, pp. 353-360; Abba Eban,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77, pp. 506-536; Avraham Adan, *On Both Sides of the Suez: An Israeli General's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Yom Kippur War*, Jerusalem: Presidio Press, 1980.
- [23] Moshe Dayan, *The Story of My Lif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6, pp. 474-539.
- [24] Yitzhak Rabin, *The Rabin Memoi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p. 236-240.
- [25]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p. 284.
- [26] Richard Worth, *Israel and the Arab States*, New York: F. Watts, 1983, p. 58.
- [27] Bregman, Ahron, *A History of Israe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142-151.
- [28] Michael I. Handel, *Perception, Deception, and Surprise: the Case of the Yom Kippur War*, Jerusalem: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Leonard Davi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76, pp. 15-28.
- [29] P. R. Kumaraswamy, ed., *Revisiting the Yom Kippur War*, London: Frank Cass, 2000 (责任编辑: 许丽梅)